

台海危机管理模式研究

陈先才 著

台海危机管理模式研究

陈先才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海危机管理模式研究 / 陈先才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6

ISBN 978 - 7 - 5108 - 0541 - 7

I. ①台… II. ①陈… III. ①台湾问题 - 研究
IV. ①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797 号

台海危机管理模式研究

作 者	陈先才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0541 - 7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4年前应邀到美国从事国际访问学者研究，时值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在与寻求连任的共和党人布什进行激烈的竞选活动。一位美国朋友听说我从事台湾问题研究，就好奇地问我说：“有人讲台湾海峡会成为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热点地区，你的看法如何？”我回答道：“在中国也常常可以听到类似的说法，不少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为了台湾问题迟早要打一仗。我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中美为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但是，台海战争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因此，我们会设法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站在一旁的另一位美国朋友风趣地插话：“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战火更有可能在美国点燃，如果克里赢不了布什，美国就会发生内战，新的世界大战就会爆发。”

克里输了，美国并没有发生内战，美国当然也不太可能因为总统选举发生战争，因为美国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现代国家，有非常完备的制度设计预防再次发生内战。我认为，台湾海峡虽然曾经是个危机四伏的热点地区，但是，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限制冲突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当中有些是客观的因素，有些是理性的定力，甚至还有充满智慧的战略筹谋。海峡两岸虽然尚未完全统一，但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分歧一定是下下策，而且两岸中国人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来避免发生战争。话说回来，毕竟人类的理性与智慧并非信手拈来，而且非理性和反智倾向总是与理性和智慧相伴而生，台湾问题如果处置不当，擦枪走火也是可能的。为了使两岸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极大化，非理性和反智倾向极小化，我们需要引入各种成熟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在深入分析问题的具体情况基础上，制定出有助于化解危机的指导原则、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台湾问题具有极大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必须未雨绸缪加以防范，而台海危机管控体系的建立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奥援。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致力于台湾问题研究，对台湾问题的由来、本质、现状

及其发展规律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置台湾问题能力的快速上升，对台湾问题进行危机管理的知识基础、能力、条件都已具备。为了使台湾问题朝着更有利于国家繁荣稳定和世界和平进步的方向发展，学术界就台海问题进行危机管理研究很有必要。

陈先才博士毕业于中国名校吉林大学国际政治系，在危机管理理论研究方面涉猎较深。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工作以来，他孜孜不倦地投入台湾问题研究，对台湾问题产生的背景、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历次台海危机，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了解。本书应用危机管理理论分析中国的危机管理问题，特别是在总结历次台海危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剖析了台海危机管理的现状与困境等问题，进而建构出新的台海危机管理模式，我赞赏这样的努力。

这项研究尚属开创性和探索性研究，文中观点凝聚着作者的研究心血，相信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共鸣，也可以发现有待改进之处。如果这本书的研究发现能够为他的读者提供决策参考，或者为更高深的创见提供研究铺垫，作者的努力就不会白费。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刘国深
2008 年 11 月 22 日于海滨寓所

目 录

导 言 (1)

上篇 危机管理理论研究

第一章 危机管理的结构与功能	(7)
第一节 危机管理的前提假定	(7)
第二节 危机管理的基本结构	(16)
第三节 危机管理的主要功能	(24)
第二章 传统安全危机管理	(37)
第一节 军事战争危机管理	(37)
第二节 地区冲突危机管理	(46)
第三节 核开发危机管理	(54)
第四节 分离主义危机管理	(62)
第三章 非传统安全危机管理	(68)
第一节 武器扩散危机管理	(68)
第二节 恐怖主义危机管理	(78)
第三节 人道主义危机管理	(87)
第四章 中国危机管理的能力评估	(100)
第一节 中国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	(100)
第二节 中国危机管理的能力评估	(103)
第三节 中国危机管理的基本模式	(106)
第四节 中国危机管理的理性思考	(112)

下篇 台海危机管理研究

第五章 台湾问题的实质与症结	(119)
第一节 台湾问题的形成和发展	(119)
第二节 冷战后台湾问题的新变化	(124)
第三节 大陆对台战略的历史演变	(130)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次台海危机管理	(144)
第一节 一九五四年台海危机管理	(144)
第二节 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管理	(149)
第三节 一九六二年台海危机管理	(155)
第四节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管理	(157)
第七章 台海危机管理的现状	(167)
第一节 台海危机管理的结构特征	(167)
第二节 台海危机管理的困境分析	(181)
第三节 台海危机管理的战略评估	(190)
第八章 台海危机管理新模式的建构	(197)
第一节 台海危机管理新模式的指导思想	(198)
第二节 台海危机管理新模式的系统结构	(204)
第三节 台海危机管理新模式的实现路径	(213)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45)

导　　言

为了准确描述某一种社会进程的基本特征，人们总会用特定的词汇来加以概括与表述——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们使用“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来描述那个时代的特征，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学者们又把它称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① 而在今天，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则成了描述这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紧密关联、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系统，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发生故障，都会引起这个大系统的瘫痪。危机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有危机就有危险，就需要对这种危险进行管理，危机管理一词应运而生。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后的战略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② 此话虽然有些武断，但也道出了危机管理对现代社会安全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危机管理不只是涉及个人、企业与国家，而是涉及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危机管理一词如同上个世纪兴起的“后”（Post-）或“后现代”（Post-modern）所具有的几乎无处不及的修饰、限制作用一样，今天的危机管理也正在变成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时髦词汇。作为 21 世纪最热门的话语之一，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可以说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的一门显学。^③

危机管理就是“管理”危机的方法和过程。正如萨姆·布莱克（Sam Blake）说：“我们处于一个易受攻击的社会。而灾难每年都似乎在成倍增加，如果我们不给予危机管理以迫切和足够的注意，我们就会失职。关于这

①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p. 228.

② C. Bell, *The Conventions of Cri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1, p. 2.

③ 邱毅：《危机管理：二十一世纪新显学》，（台）中华微信出版社，第 35 页。

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①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危机管理这一术语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②，当时，正值美苏两个大国处于冷战的高峰时期。它原意是指“赢得外交胜利的艺术”，^③ 该术语的出现，主要是针对美国如何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以此来探索美国及其盟国保障国家安全的可能性。危机管理作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直接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和平与安全一直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懈追求的理想，也是一个国家首要的动机和目标。^④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这项任务变得轻松，相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时期^⑤，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危机管理不仅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有力手段，而且也是推进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与发展的动力。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冲突、危机的表现形式都呈现出较大的变数，因此，加强危机管理对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的国际体系由于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数目的急剧增加，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急剧扩大，国际体系变得日趋复杂。日益增多的行为体卷入国际政治，产生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且，一些国家的政府变更也会产生危机。因此，诸多危机同时爆发是有可能的，即多元危机的产生。在动荡的国际社会中，危机管理是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有力手段之一。通过危机管理，降低危机管理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尽力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当前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一些热点及地区冲突，由于涉及复杂的历史、宗教、民族及领土的背景，在一

①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Summer 1983, p. 332.

② 人类社会自从相互依赖的关系形成后，危机状态就一直伴随着人们。但是专门的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的出现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危机管理研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的，因此多数学者把美苏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作为危机管理的起点。

③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88 页。

④ David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1, 1997.

⑤ 美国学者奈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已进入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时期。他指出：“1500 年以来，每一次大国战争之后都伴随着一个不确定时期。此时，政治家们都试图改变国际体系或对其进行调整，以防止大国战争再次爆发。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个不确定阶段，一次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战争’——冷战刚刚结束。”同时，奈还把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分为大国战争、地区战争和内部战争三种类型。他认为，地区冲突已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详见 Joseph Nye, “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

定的时间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对这些容易引发危机与冲突的热点问题加强管理则显得尤为必要。同时，危机管理对世界新秩序的建构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危机一直是影响国际局势发展，关系国际和平的重大事件，只有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才能切实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为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危机作为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和国际相关性不断增长的典型伴随现象之一，加强危机管理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①，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危机的发生频率将越发呈增长之势，在这种条件下，随着国际联系的普遍增多，国家需要处理的危机事务不断增加，加强危机管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台湾问题作为上个世纪国共内战的遗留物，至今已有 60 余年，它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台湾问题先后爆发了四次重大的台海危机，这些危机事件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极大的损害。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台湾当局大搞“台独”分裂活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对台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核心任务。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在“台独”分裂道路上的活动不断加剧，最终酿成了 1995—1996 年的重大台海危机事件，两岸差点擦枪走火。在民进党八年执政时期，陈水扁当局“台独”分裂活动愈演愈烈，两岸关系陷入了长时期的低谷阶段，台海地区的危机情势不断出现，严重损害了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当前，随着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放弃民进党执政时期的“法理台独”分裂路线，两岸关系迎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这大大降低了台海地区发生重大危机事件的可能性，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不断形成。特别是“海协会”和“海基会”时隔数年再度复会，并成功签署包括两岸“全面三通”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协议，对

^① 基欧汉和奈认为，随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国际社会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特征不断突出起来，导致一系列的全球问题的不断出现，诸如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生态安全等，这些都需要国际社会协调行动上，加强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参见 Michael Sue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ledge, 1997, pp. 90 – 120.

于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尽管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岛内“法理台独”的现实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两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全面执政而全部化解，两岸在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台湾参与国际空间、“中华民国”等敏感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台湾岛内的分离主义势力仍然存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同时，由于两岸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隔阂，两岸民众之间的误解在短时期内也很难化解，两岸之间要走上真正的完全的和解之路还有很多的困难。加上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政党竞争是岛内政治生活的常态，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未来民进党等“独”派政党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此外，虽然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台海危机不是国际危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美国等外部势力不断介入台湾问题，使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特征不断显现，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外部势力介入台海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这样说，只要台湾问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台海危机的再次爆发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强台海危机管理研究，为构建和谐的两岸关系，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条件。

上篇 危机管理理论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危机的频频爆发对当代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重大的战略险情，危机管理研究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一门显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的显著增强，加强对危机管理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和时代所需。如何超越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构建适应时代特征的新型危机管理模式，以应对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因此，本文对冷战后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安全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危机的管理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并对中国的危机管理能力进行了评估。为下篇台海危机管理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此，本篇对危机管理的探讨主要分四章进行。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危机管理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以作为后文讨论的前提和基础。第二章考察了传统安全危机的管理模式。本文将传统安全危机划分为军事战争危机、地区冲突危机、核开发危机和分离主义危机等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分别对这四种传统安全危机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第三章研究了非传统安全危机的管理模式。这里把非传统安全危机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机、恐怖主义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危机等三种类型。在对这三种危机的管理模式进行现实考察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指出了它们的优劣之处。第四章对中国危机管理的能力进行了全面的评估。首先分析了我国当前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为后面对我国危机管理能力的评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全面分析了我国危机管理的基本模式。即坚持政治上的睦邻友好、经济上的合作共赢、外交上的多元制衡、文化上的共存互补、方法上的和平解决及策略上的主动塑造的危机管理模式。

第一章 危机管理的结构与功能

危机管理是直接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一些人所希望的“霸权下的稳定”，也没有带来其他一些人所期待的“多极下的和平”^①。相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安全环境面临着一些新的重大挑战，加强对危机管理相关理论的研究，这本身就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化发展赋予时代的重大任务。作为一项管理活动，危机管理必然是在一个特定的系统结构中进行的。^② 对任何一个系统而言，系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而系统的功能影响其结构的稳定性。危机管理系统作为一个全球系统，不仅要求其结构稳定，而且要求其功能有序。因为不和谐的危机管理结构必然导致其功能的紊乱，从而造成危机管理系统的不稳定，而失效的危机管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危机管理结构的稳定性，从而导致系统的动荡。因此，加强对危机管理的基本结构及主要功能的研究，对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危机管理的前提假定

危机管理是指为防止危机情势长期恶化乃至引发战争而对危机进行预防、决策、应对、解决、后续处理的整个管理过程。一般而言，一国危机管理的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能使我们

^① Charles W. Kegley, JR, Gregory A. Raymond, *A Multipolar Peace? -Great-Power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p. 221.

^② 在这里，笔者借用伊斯顿的国际系统（即在尝试建构一种关于政治的一般理论时，采取了一种系统分析的方法）的提法。关于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的理论，主要来自于他的两部著作（中文版）。《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第二版；《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在分析中，伊斯顿所使用的词语是“political system”，但是system一词在英文和中文中都有系统与体系的涵义。

们大致把握该国在危机管理方面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从而为我国的危机管理的实践提供参考作用。不言而喻，危机存在是否可以被管理的特性。事实证明，成功的危机管理必然是有关各方都有最终接受政治或外交解决的意愿、并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危机中的一方决心通过战争或暴力方式寻求成功，或各方宁愿面对风险乃至战争也不准备妥协，则此种危机是不可管理的。^① 在本文的研究中，危机都是指可以管理的危机事件，不能管理的危机不是本文的研究范畴。通常，危机管理还面临着一些不可回避的内在矛盾，这些内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导致危机管理的失效，因此，加强对这些内在矛盾的分析与研究，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基本任务。

一、危机管理的影响因素

影响危机管理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历史文化传统的惯性思维、国家利益与国家实力、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格局等等。

历史文化因素对危机管理的影响和作用非常大。它主要包括一国的历史发展经历、民族性格、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方面。^② 文化观念对危机管理的影响非常大。比如美国文化的“天定命运”等理念，同其“输出自由”的战略，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价值观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之中，当他们体现在美国的具体外交政策上时，多数情况下变成了对美国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堂而皇之’的掩饰或‘振振有词’的解释。”^③ 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影响着各国的对外行为，由此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两大阵营冲突的根本原因。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峙中，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尖锐对

① 胡平：《国际冲突分析与危机管理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② 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概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对文化的界定多达数百种。但总的来说它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是强调文化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凝结和精神财富的积累，在精神层面，包括精神信仰、哲学体系、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性格、伦理观念等；在行为层面，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家庭模式、行为礼仪、人际关系、节日庆典等；在制度层面，包括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法律典章等；在物质层面，包括服装饮食、居住条件、交通手段、艺术技术等。狭义上的文化主要是指一定的人类群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形成并积淀起来的观念和心理。在西方社会学中，文化主要是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

③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立。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客观上使世界分割成两个截然对立的文化单位和文化权力，由此也显出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巨大分野和明显对立，导致彼此的隔离和纷争。冷战后，虽然意识形态因素的不断弱化，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往却日益广泛和深入，正是这种交流使得各国的文化差异得以彰显。文化因素成为引发国际冲突与国际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以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最为突出。他认为文化冲突的基本动因在于社会制度文化的剧烈对抗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最具冲突的文明将在西方文明、伊斯兰文化和儒教文明之间展开。^①“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曾被克林顿政府推广到科索沃危机之中，克林顿在解释美国出兵的战略动机时，就曾对科索沃的价值地位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诠释。克林顿认为，科索沃就是处在欧洲、亚洲和中东这些针锋相对的文化之间。^②冷战后，由文化因素引起的国际冲突与国际危机，最鲜明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具体说，就是西方文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突。^③这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冲突与其说是文化冲突，不如说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一国的历史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该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行为方式。目前，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朝鲜、伊朗这两个国家和美国长期的极端敌视与冲突分不开的。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单纯的文化因素并不会引发国际冲突。美国著名学者奈认为，文化冲突并不必然引发国际冲突与国际战争。^④福勒（Graham Fuller）也认为，“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⑤实际上，引发国际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② Cited in Goulet, D (1999), Development Ethics, Zed Books, London, p. 19.

^③ 原教旨主义运动是西方学者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激进派势力的称谓。在西亚、中亚、南亚、北非等伊斯兰国家，宗教意识十分强烈，这些国家在摆脱外来控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带民族性、宗教性和文化性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并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势力。伊斯兰激进派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侵略伊斯兰国家，而且通过文化侵略，污染其社会，瓦解其民族的团结和复兴。因此，他们主张伊斯兰各国的宗教、国家生活都以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为依据，净化伊斯兰民族的一切，建立政教合一的制度，联合起来反对西方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操纵和侵略。

^④ Joseph Nye, “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

^⑤ Graham Fuller, “The Next Ideology”,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冲突的原因相当复杂。这其中既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经济、^① 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国家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影响危机管理的首要因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决定了国家实力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一国危机管理的能力高低与危机的大致结局。例如在围绕伊拉克核查危机的较量中，美伊（拉克）在国家实力上的过分悬殊是造成伊拉克政府危机管理失败、萨达姆政权被推翻的最根本原因。国家利益作为影响危机管理的重要变量，它与危机、危机管理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即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危机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危机管理的决策者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危机管理方式，都必须牢牢把握国家利益这根主线，在防止危机演变为战争的前提下，正确评估国家利益的得失。首先，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影响危机的程度及危机管理的方式。任何国家都会对国家利益进行层次划分，并依据不同的利益等级决定国家在国际危机中的卷入程度及危机管理的方式。对国家利益进行层次划分，可以避免把国家利益的概念过于抽象化，可以避免在决策中对国家利益轻重缓急上的判断失误和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同时可以保持其政策的灵活性，利于决策者进行战略调整。^② 例如，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U. S. National Interests Committee）2000年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就把美国国家利益分为四个层次，^③ 并在这个层次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则。其次，国家利益的博弈也是危机管理的主要内容。国际危机发生后，一般说来，危机的当事国都想在防止冲突升级（除了故意引发冲突外）、避免战争的前提下就国家利益讨价还价。这实质上是

^① Michael Magarr,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ew Essa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6.

^②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56页。

^③ 即对于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即使在没有盟友参与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美国也要准备投入战斗；对于极端重要的利益，美国只有在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威胁的盟国的共同参与下才应准备运用武装力量；对于重要的利益，美国应个案处理，并且只有在低代价和其他国家分担最大费用的情况下才应参与军事行动。参见李少军：《论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6页。